

# 坚持马克思主义 继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宋逢明

一百多年来，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奋斗，终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找到了民族繁荣和祖国昌盛的发展道路。在经济建设蓬勃发展、市场经济逐渐确立、商品大潮汹涌而来之际，中国共产党人，尤其是党的理论工作者，更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战线上确保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贯彻实施。

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遇前所未有曲折的历史条件下，为什么中国共产党非但屹立不倒，反而领导中国人民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更要追根溯源的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在其故乡，在市场经济相对发达和成熟，工人阶级力量强大的欧美国家没有取得胜利，而在东方尤其在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对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来说，尤其是在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体制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被证明是不成功的事实面前，马克思主义是否依然能够指引中国人民在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道路上不断取得胜利？这些都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严肃的共产党人必须予以思考和解答的问题。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文中有一段名言：“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有靠物质来摧毁，但是，理论只要掌握群众，也能转变为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能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是彻底的，就能说服人”。我认为，所有这些重大问题都必须放到更为深层的历史精神文化层面加以

分析，才有可能获得正确的结论。

## 一、西方的二元论文化与马克思主义

以基督教精神为内核的欧美主流文化是一种二元文化，这种文化的巧妙结构在于“心物二分”，即精神与物质的分离。基督教的教义告诫世人：世界是神创造的，世界的秩序是神规定的，在通常情况下神维护这一秩序，但在神认为必要时也可以违反自己规定的秩序，显示“神迹”，向人世证明神的存在和力量。《圣经·新约》中耶稣救世的许多故事讲的就是这些“神迹”。因此，神的世界是心灵的世界，是不能用科学理性加以解释的。信徒只能通过祈祷与神沟通。而且，基督教是启示性的宗教，即在人的日常生活中，神通过各种喻像向人显示神的意志，而信徒通过祷告可以获得神的启示。基督教以“末日说”将人类的历史描写为一个救赎的历程，这是天意规定的向末世演进的历史观。对“世界末日”的期待和通过“末日审判”升入天堂，是信徒们的终极理想和精神寄托。

从哲学的历史发展角度看，西方的这种二元论文化则表现为从笛卡尔的二元论哲学、康德和休谟的怀疑论到至今在欧美有深厚影响的经验主义、实用主义哲学。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许多优秀的科学家同时是虔诚的宗教徒也就不足为怪了。实事求是地说，这样的二元论文化也有它积极的方面。当苹果从树上掉到地面，中国人认为这是自然现象不假思索，而西方的科学家则要探索神的规则为什么

## 工作研究与建议

让苹果往下掉而不是朝上飞，并由此发现了万有引力。在几何学和牛顿力学基础上建立的笛卡尔二元论哲学，曾经认为自然界是完全可以几何图景和力学规律刻画的，这种哲学思想对于西方的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产生过积极的引导作用。而由怀疑论发展而来的经验主义推动了实证的科学研究，产生了经济学、社会学、法学、政治学等现代科学成果的丰硕的经验实证研究成果。因此可以肯定，这种二元论文化哲学在工业化时代是起过积极的主导作用的。进一步还可以分析这种文化哲学在西方法制社会建设方面的深层次影响。毋庸置疑，这种文化哲学深深地根植于西方的思想土壤，其作用力是十分巨大和顽强的。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大来源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无论是黑格尔的辩证法还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都是一元论的。黑格尔的辩证法是观念的一元论的发展观，是颠倒了的世界观。马克思的伟大功绩在于将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相结合，将被黑格尔颠倒了的世界观再颠倒过来，用物质的一元论代替了观念的一元论，同时保存了黑格尔辩证法的革命思想，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这样的一元论的世界观和方法文化，与西方传统的二元论文化是直接冲突的，是很难在短时期内进行整合的。其实，就黑格尔哲学而言，虽然西方思想界也不得不承认其在思辩上无可置疑的精湛绝伦，但事实上并没有成为主流思想。西方思想哲学的发展线索是沿循怀疑论的二元论。我认为，从思想文化层面看，辩证唯物主义一元论世界观与西方二元论文化的不相容，应该是影响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国家的传播，并被西方世界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的一个重要原因。

## 二、中国思想文化的三次整合

中华民族有五千年光辉灿烂的文明。先秦之前的文化，由于当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下和书写记录技术的落后，我们今天虽然可以从甲骨文和钟鼎文的研究中找到一些线索，但还是难以获得比较系统和全面的认识。而且，从部落制到封建制，当

时的中国还没有形成一个真正意义的统一国家，各诸侯国的文化应当是带有地域色彩的。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形成历史上第一个文化繁荣的时代。秦汉王朝统一中国，伴随而来的是中国文化的第一次整合，建立起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结构。西汉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上是对先秦诸子的思想进行了筛选和吸收，构筑起以孔孟之道为主体的思想文化体系。其中很重要的是吸收了道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天人合一”思想，这与汉初采用黄老哲学“无为而治”安定社会取得成功有关。这样的思想结构以孔孟的“仁”“礼”思想为核心，形成了伦理价值与社会制度相统一、知识分子的自省修身与积极人世相统一（“内圣外王”）的世界观和伦理学。这样的思想体系是一元论的。而且，这样的思想文化是道德理想主义的，以追求道德理想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其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知识分子的行为规范。可以说，中华民族的主体文化在形成之初就是一元论的，强调精神与物质的不可分离，主动地积极地追求道德理想，与西方的二元论文化有着根本的区别。

从东汉起，佛教开始传入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伴随西域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来自尼泊尔、印度的佛教大举进入中国，中国文化首次遭遇外来强势文化的挑战，中国思想文化进行了艰苦的长达数百年的第二次整合。中国文化对佛学思想进行了全面的筛选和创造性的改造，将其融入自身的体系。中国式的佛教强调“人人皆有佛性”，赋予佛性以道德的理念。解除了佛教以出世解脱作为终极目标的消极性，改造为“普渡众生”的积极的人世宗教。达摩从印度来到中国，一苇渡江创立了中国佛学最重要的流派禅宗。禅宗直指人心，六传至慧能进行“六祖革命”，发展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顿悟”学说。这样，佛教对强调“天人合一”的中国一元论思想文化也不再具有根本性的威胁，而佛学经典的教义又大大丰富了儒生自省修身的内容，并以“慈悲心”的理念融入中国文化的道德理想。当

儒学发展到宋明理学的巅峰时期，佛学和儒学完成了完全的融合。从宋元至明清，程朱陆王等大儒们对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思想文化有重大的发展，但无论在程朱理学还是陆王心学中，“天人合一”的一元论结构都被继承和保持下来。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在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发展史中，是根深蒂固的。而追求道德理想的文化精神，始终是其中的精华。

到明末清初，王船山等人将“天人合一”的思想结构发展为“气论”，讨论“理”与“气”之间的关系。理气一元论的思想实际上已经有明显的唯物主义倾向。

在近代，帝国主义凭借其先进的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通过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各种西方思想文化蜂拥而至，使中国文化遭遇空前的外来强势文化的挑战。在民族危亡的深刻危机中，中国的思想文化开始了第三次伟大整合的历程。对外来文化的筛选和吸收，伴随着艰苦卓绝、惊心动魄的革命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革命理论，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这一文化整合的历程并未结束，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中华民族在这次文化整合过程中的光辉创造。

### 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结合

具有“天人合一”结构的中国传统文化，虽然是一元论的，但还是形而上学的，在总体上是倾向唯心主义的。而这种唯心主义和黑格尔哲学类似，是主观唯心论而不是客观唯心论。“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使理学形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伦理观念变得凝固、僵化和保守，成为束缚生产力发展和抑制人民群众追求自由解放的精神桎梏。伴随帝国主义侵略而来的西方文化对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冲击，产生了严重的思想文化危机。其反应形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以理杀人”和“打倒孔家店”的呼号。自从中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一百多年来，中国的先进分子进行了学习西方科学文化救国救民的艰苦探索。但是，西方有

神论的二元论文化和中国无神论的一元论文化在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是很难融合的。中国人学习西方科学文化救国救民的探索以失败而告终。这说明，尽管当时中国思想文化已经明显地暴露弊端和停滞不前，但在对抗西方二元论文化方面依然是顽强有力的。

在中国人向西方学习没有找到出路而传统文化被瓦解的时期，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陷入贫弱和混乱的悲惨境地，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找到了解放和振兴中华的正确道路。

在文化哲学层面，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贡献是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改造了中国的思想文化。类似于马克思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改造，把中国传统的唯心主义一元论转变为唯物主义的一元论，即把颠倒的世界观再颠倒回来，同时引进了辩证法，否定了传统文化中的形而上学。中国传统文化哲学中的一元论和实践观，与辩证唯物主义有天然的亲和力，正是这种改造成功的基础。这种具有彻底性的理论一旦为人民群众所接受，就转化为改造社会的巨大物质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

因此，中国文化的第三次整合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结合，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对中国文化的改造，这一文化整合的进程还在继续。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国人民拨乱反正，恢复了马克思主义本来的科学面貌。在文化哲学层面，邓小平理论是继续用辩证唯物主义改造中国的思想文化。“发展是硬道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思想是辩证唯物主义在政治上集中表现，而“改革也是革命”的重要论断则是对唯物辩证法的重大发展。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中，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相结合的进一步重大发展，也是用辩证唯物主义科学世界观改造中

## 工作研究与建议

国文化的巨大创造。在市经济蓬勃发展的条件下，向共产党员和全体人民呼唤道德理想，在商品大潮的物欲横流中不至于迷失方向，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根本性任务。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和全体中国人民的道德理想，是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取得成功的思想保证。在精神文化层面，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科学世界观，继承和发扬中国文化中追求道德理想的优秀传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

### 四、在全球化背景下坚持马克思主义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国参加WTO，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在引进国外资本，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管理方法时，不顾中国的国情和实际，盲目地照搬照抄，全盘西化，将会给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带来巨大的风险和严重的危害。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盲从西方国家，采取“休克疗法”所造成的严重经济和社会后果，是不容忽视的前车之鉴。

在向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学习的时候，一定要看到不同国家之间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方面的差异，尤其不能忽视深层次的文化差异。西方的政治社会制度是建筑在有神论的二元论文化基础之上的，这一文化基础对经济体制方面也有深层次的影响。中国在发展市场经济的现代化进程中，一方面要老实地遵循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学习西方国家成功的经验，但另一方面，必须非常谨慎地在制度建设方面处理有差异的地方，特别要注意到文化差异方面的影响。中华民族在第三次文化整合中，一定要坚持自己的文化主体性，决不能全盘接受西方的二元论文化，而只能学习和吸收外国文化中的先进优秀成分。

我们必须明白这样的道理：只有民族化才是真正意义的国际化。“科学无国界”，这一道理对于自然科学来说是比较明显的，但对社会科学来说，应该有正确的理解。人类社会发展无疑存在具有一般真理性的普遍规律，即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但是，任何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先进成果，在引进时必须与本国实际相结合，才能真正实现其价值，否

则不但没有好处，还可能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在学习引进时，一定不能死搬硬套。在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中，有许多理论模型是基于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社会的模式来进行分析的，这些理论模型不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国的经济处于改革、转型和发展的过程之中，经济的结构和表现形态都与西方尤其是美国有很大的差异，在政治、法律和社会结构方面则有更大的差别。美国模式不可能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更不能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文化发展的目标模式。

在思想文化层面，我们绝不能对西方发达国家抱有“愧不如人”的卑微心态。辩证唯物主义是科学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经辩证唯物主义科学世界观改造的中国文化，在后工业化时代，在新经济时代，一定会越来越显示其优势。当然，有神论与有神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一元论与二元论，谁是谁非会长期争论下去。唯物主义要发展，唯心主义也会演化。但是，中国文化在不断吸取世界其他文化优秀养分的整合发展过程中，一定会万古常青。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结合，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改造中国文化，指引中国人民在革命与建设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人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优良传统是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反对本本主义。本本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死搬硬套。在发现本本中的某些论断和结论不正确时，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活的思想内涵，这实际上是本本主义另一面的表现。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要一如既往，理直气壮地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通过严肃认真的研究，探索具有彻底性、能够说服人的理论，推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道德理想建设，应该是在思想文化战线上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科学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无往不胜的思想武器，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中崇高的道德精神，一定能推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

(作者为清华大学教授)